



程俊英自述

我名程俊英，福建福州人，1901年生，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先父程树德，清朝翰林，日本法政大学毕业，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教习。辛亥革命后，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教授，著有《九朝律考》、《说文稽古编》（以上二书均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论语集释》等书。先母沈缙珉，清末福建女子师范学校第一届毕业生。她少有大志，想做一个不依靠丈夫而能独立生活的妇女。那时恰好有一位亲戚当了学部的主事，她曾带我到主事家里请求介绍职业。主事听了，拍手哈哈大笑地说：“现在北京哪一部、哪一校有女子在那里办事教书的，你说说？如果我向部长介绍你，人家不是把我和你都当成怪物吗？”我母听了，只好垂头丧气而归。不久，先父娶了小老婆，她从此郁郁寡欢，把希望寄托在我身上。我也立志读书，想替母亲出口气。有一天，邻居的小姑娘穿了一件新色的花布衣，我央求母亲也替我做一件。她厉声问：“士何尚？”我吓得轻轻地回答说：“尚志！”她又厉声问：“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你记得吗？”我不禁垂泪回答道：“记得！”我同情母亲的遭遇，羞愧自己的无志，心如刀割，等她息怒，才偷偷地写了一个“志”字贴在墙上，朝夕以此自警。每日背诵她所讲授的“四书”、“五经”、“文选”等教材，不敢稍有怠

情。

1917年夏，阅报得悉北京女子师范学校附设的国文专修科招生（要交中学毕业文凭），我欣喜若狂，征求母亲的同意，向校方申请，以同等学力去应考。在短短两个月的暑假里，日以继夜地读完了中学的史、地等教科书。到发榜时，竟被录取。考取后，父亲不让去，认为一个女孩子，住到外面去读书，不成体统；但母亲支持我，终于收拾起书籍行装，从家里逃了出来，在这个学校住读了五年。这是我一生的转折点。清朝末年，废科举，学习外国的学制而兴办学校，北京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只许男子入学。后来又在都城及大城市各办一个女校，北京只有女子师范一所，该校附设的国文专修科，是大学性质的，全国也只有这一个专修科。过了两年，北京女子师范改为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国文专修科改为国文部，我是该校的第一届毕业生（1922年毕业）。由于这个转折点，使我有机会参加五四运动的行列，接受新思想、新文学的洗礼。

我班同学共四十多人，除北京招来的十三名外，其余多由各省教育厅保送入学。初入学的时候，虽然大家都有逃出封建家庭升入高等学校的一番喜悦，但一年住下来，总觉得石驸马大街红楼不像理想那样美丽。与此相反，门禁森严的看守，校长严厉的监督，学监日夜的检查，《礼记·内则》的讲授，桐城古文的习作，一切的一切，全不合一群壮志凌云的女青年的理想和要求，引起了我们极度的反感与无限的苦闷。大家都说，与其窒息而死，不如吐气而生。于是，马上请求校长撤换班主任戴礼（女，国文专修科主任，是一个老朽，讲授经学，宣扬封建伦理道德，阐述男主外女主内的礼则）和陈树声（男，讲授古文，是个专讲桐城义法的老朽）的职务。校长不得已，另请北大哲学部毕业生陈中凡老师为主任，讲授“经学通论”、

“诸子通谊”两门课。陈老师是蔡元培的学生，他继承蔡老师“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把北大哲学部、国文部的老师，多半请到我校任教。新潮派如李大钊、胡适，国故派如刘师培、黄侃，都是我最钦佩的老师。他们给禁锢的女高师，带来了一股清新的革命空气。在李大钊老师的“社会学”和“女权运动史”两门课上，我第一次知道了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了解了俄国十月革命的一些情况以及世界劳动妇女争取自由平等的动态。第二年，他加授“伦理学”一课，深刻地分析、批判封建伦理道德的实质及其欺骗性。记得李老师在一次上课时，身穿灰色布棉袍，大声疾呼道：“马列主义给妇女指出一条正确的道路，只有社会性质改变，只有实现共产主义社会，妇女才能获得真正的解放。”将近考试时，他在黑板上写了一个论文题目：《论妇女解放》。到评卷时，他挑选我做的一篇离经叛道的文章，送到女高师校刊去发表。李老师又大力介绍《新青年》、《每周评论》等刊物让我阅读，其中《青春》、《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给我的教育尤为深刻。《孔雀东南飞》话剧是五四运动后我级同学的集体创作，以汉乐府诗《孔雀东南飞》为底本，改编为五幕剧，发表在陈大悲主编的《戏剧》杂志上，并借教育部大礼堂公演四天。演员由我级同学担任，冯沅君扮焦母，孙桂丹扮焦仲卿，陶玄扮刘兄，陈定秀扮小姑，我扮刘兰芝。导演者，就是我们最敬爱的李大钊老师！李老师和李师母、李星华、李葆华同志都来观剧（见李星华《有志青年的良师》一文，1979年《文汇报》）。《孔雀东南飞》的剧词缠绵悱恻，许多观众看了都流泪不止。我在台上忘记了自己的存在，仿佛觉得自己就是刘兰芝，就是无数被封建礼教害死的妇女冤魂。《孔雀东南飞》虽然是一出历史剧，但在当时演出，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体现了五四时代知识界妇女要求

摆脱吃人的封建礼教的束缚，争取婚姻自由的强烈愿望。同时还对一千多年来文坛上轻视艺人，轻视俗文学的旧传统作了顽强的反抗。

胡适老师教我们“中国哲学史”，讲义是用崭新的白话文写的。《新青年》中的《文学改良刍议》一文，提出“八不主义”，给我的影响尤大。我过去一直做文言文或骈文，认为只有俗文学的明清小说等才用白话写，白话文是不登大雅之堂的。经他在课堂上的分析、鼓吹，我从1918年起就不做堆砌词藻、空疏无物的古文了。但对新诗还有保留的意见，如《尝试集》中的“一对黄蝴蝶，双双飞上天；掉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总觉得它的味道不如旧诗词之含蓄隽永，所以仍旧跟着黄侃老师学诗。当时，我渴望能看到全部的《新青年》杂志，而我校图书室的这种杂志皆零乱不全。有一天，我和同学舒之锐到南池子胡适老师家借《新青年》杂志。看门的领我们走上正房的头一间，门外挂着“来访座谈不得超过五分钟”的小木牌。进书房以后，见胡先生正在伏案写作，我们说明来意，他很爽快地把书橱里的全套《新青年》取出来，我们立刻告辞，他说：“女学生不在此限，多坐一会儿。”又说，“最初这杂志是陈独秀办的，现在由他和我、李大钊等六人轮流编。”回校以后，我一口气从第一卷读到末卷，顿觉头脑清醒，眼睛明亮，好像从“子曰诗云”的桎梏里爬了出来一样。

刘师培老师担任《文心雕龙》课程，黄侃老师担任“中国文学史”和“诗歌选”课程。我从中了解到中国的文学理论和文学发展的概况。刘老师学问渊博，对经学尤有研究，素为陈中凡、黄侃老师所敬仰。当时他患肺病，教室里生着又大又旺的壁炉，他仍须烤手炉，喝热茶，说话声音极小，咳嗽不止。学校雇马车接送他，但他不到一学期就不来了。后来听说他病

重，我们都很伤心惋惜。黄侃老师教学法很新颖，登上讲台，他让我们先出一个题目，自己在黑板上先示范地做一首诗，接着让我们在台下也各做一首诗，然后他又在黑板上写了古人同题的诗一二首，讲解它的艺术特点。师生诗和古人诗互作比较，课堂气氛显得特别活跃，一星期练习一次，他确实提高了我诗歌习作的水平。

1919年，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爆发了。在五四的第二天，上午上课，陈中凡老师登上讲台，严肃地对同学们说了这样的事：“昨天北大各校三千多人结队游行，警察厅派人逮捕了许多学生，高等学校多半罢课。”这是陈老师对我们的激励。早已蕴积在我心底的那股冲破一切封建樊笼，建立全新的科学民主中国的爱国火焰勃然燃起。我和同学们在李大钊老师和北大学子的领导下，组织起学生自治会，我们的口号是“罢不罢，看北大”，从此女高师就正式加入北京学生的队伍中去。我经常和同学们一道开会，编写刊物《女界钟》（只出二期，因当局到印刷所干涉而停刊），到街头讲演宣传罢市。我这一团的团员是张曼君、冯沅君、关应麟、罗静轩连我五人，推举张曼君为团长，到宣武门大街和骡马市一带宣传罢市，得到良好效果。6月4日那天，我校学生自治会开会决定游行，并上书总统，提出释放被捕学生，尊重学生人格，自由讲演，立即撤退包围北大的军警等要求。当我们整队出发的时候，看见前面两扇大铁门，已被方还校长用大铁锁锁上了。只好从后门破壁而出，钱丞同学带头冲锋，我们就浩浩荡荡、扬眉吐气地走到新华门。沿途军警密布，枪械森严。我们昂首挺胸，旁若无人。这次游行影响很大，引起了各地的罢课、罢市，政府终于释放了被捕学生，免去了曹汝霖、陆宗輿的职务。我们得意地说：“这是中国有史以来女子第一次的干政游行。”回校以后，得知

方还校长将这次游行归罪于陈中凡老师，我们立即召开驱方会议，决定起草驱方宣言，由冯沅君、高晓岚、罗静轩和我草拟，数他十大罪状，印成传单散发，并送教育部一份。是年7月，教育部免方还职，委毛邦伟为校长。毛校长继续聘请李大钊老师、陈中凡老师等回校任教。同时，我又参加北京福建同乡会，开会的时候，认识郑振铎、郭梦良（后和我级同学黄庐隐结婚，已故）等人。

我和同级学友比较谈得来的，有黄庐隐、王世瑛、陈定秀三人，后被人称为“四君子”。黄庐隐著的小说《海滨故人》一文的题材，即取自我们几人的生活，其中也谈到了王世瑛和郑振铎的关系。1920年，我级出版《文艺会刊》，我写了文章和几首诗歌在该刊上发表。是年冬，《益世报》约张崢漪同学和我担任该报《女子周刊》的编辑，投稿者除我们二人外多为我级同学。现在回想起来，我们虽为妇女提供了一发发反封建的炮弹，但也有情绪不健康的作品。那时，同学李超因反抗封建家庭包办的婚姻，不愿嫁给素不相识的官僚，与兄嫂断绝了来往，贫困气愤而死。我参加她的追悼会，女高师礼堂内外挂满了挽联，陈独秀老师主持追悼会并在会上发言，激昂慷慨，博得同学们和来宾们的热烈鼓掌。整个北京的进步阶层义愤填膺，誓做李超同学的革命后盾。胡适老师也在会上讲话，会后做《李超传》一文，收在《胡适文存》里。不久，陈独秀老师又到我校讲演，谈民主科学与妇女解放等问题，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接着，蔡元培校长也来了，谈“国文之将来”，大家都说，我们别再做文言文了。

1921年，我参加学生组织的杜威研究会，听过蔡校长的公开讲演，又参加北大罗学研究会，听过罗素几次讲演。有一次，在哲学老师傅铜南池子家里开晚会，冯沅君和我去参加。

会上认识冯沅君的情人王品青（北大学生，已故）。会后余兴，罗素年轻的情人勃拉克在庭院里跳起了拉船舞，神态骄傲，我不理她。1922年春，我级集体到日本各地考察教育（用演《孔雀东南飞》的售票费做经费），由教务长李贻燕带领。我赴日本所得的印象，第一是：注意清洁卫生，无论房内房外，都非常干净。一般人每日都洗澡，食物定量定质，人们体质比较健康。第二是：教育有一定的方针，男女不同。男的培养成武士道式的有一技之长的人才，女的除学习专业外，另设家事一课，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关于育儿、烹调、相夫的实习，应有尽有，培养她们成为一个好妻子、好母亲。第三是：女子在家庭的地位低于男子，丈夫吃饭时，妻要跪在小桌旁边服侍丈夫（我曾到东京上、中、下家庭参观）。第四是：女子在社会上工作的较少，妓女较多（我曾到京都妓院参观）。这些，对我的工作、择夫有一定的影响。

是年夏毕业，级主任胡光炜老师（南京大学教授，已故）留我担任校刊编辑，兼女一中两班课。这时，我校已改为北京女子师范大学，许寿裳担任校长，鲁迅在国文部任教，许广平初入学。后来听说化学部许羨苏同学和鲁迅亦有交往，时人称许广平与许羨苏为“二许”。是年秋，我和张耀翔在天坛订婚，坐在祈年殿石阶上，誓以尽瘁教育为我们二人的终身职责。时张耀翔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兼教育研究科主任与女高师保姆科儿童心理课。1921年春天，我校教务处邀请耀翔作公开讲演，谈“心理测量”，让我担任记录，会后将记录稿送他审阅，那时我们才相识。1923年2月12日我们在北京报子街聚贤堂结婚，来宾约千余人，多为当时教育界人士和在校学生。结婚以后，我们住在宣外教场五条，名吾斋为“望海居”（耀翔小名“望”，我小名“海”），课余之暇，读书于其中。不久，我

患风湿性关节炎住医院，校刊拿到医院里编。校方责我编得不好，第二年不续聘，耀翔愤而辞去女师大的教职，到中国大学兼课。1924年到1925年我在群化中学等校任课。1926年，傅铜老师担任女师大教务长，黎锦熙担任国文部主任，聘请我们二人回校，我担任校刊编辑兼一年级国文教师。

1927年，听说李大钊老师壮烈牺牲，我和耀翔在院子里摘些鲜花，插在瓶中，朝着墙上挂的我级毕业照，向他鞠了三个躬，表示仰慕悼念之意。这时，北京闹欠薪，我们已有三个女儿，负担渐重，忙于家务，除上课外，几无力兼顾学术的研究。1928年，上海大夏大学欧元怀校长约耀翔来沪任教，他不得已辞去北京男女两师大的课务到了上海，并到南京大学兼课。时我母患癌症，我日夜服侍汤药，未能同往。1929年夏，我母不幸逝世。适上海暨南大学约我们任课，耀翔辞去南大而就暨大与大夏，我亦辞去女师大教职而就暨大。全家都住在上海郊区真如暨南新村，傍晚多带五个孩子散步于杨家桥和张家花园之间。有一次，耀翔对我说：“我们虽为夫妻，但又是志同道合的情人和挚友，这种复杂的关系，确实是人间不可多得的！特别是在这种黑暗时代，我们同隐于教书，不参加任何党派，不混进肮脏的官场里去，可谓无愧于祈年殿前的誓言。但应付各方面的拉拢，可不容易啊！”

1934年，暨南大学更换校长，由何炳松继任。郑振铎担任文学院院长，他是我五四时代的老友。从此，我们来往甚密，由他介绍认识暨大经学老师周予同教授、社会学老师吴泽霖教授。郑振铎常约我们到他家品茗闲谈，有时烧几碗福建茶对酌，参观他藏书楼的各种善本和版画，他的挚友周予同多在座。吴泽霖在抗战前夕担任大夏大学教务长，约我到中文系任教，聘书已发，以大夏迁贵阳而未果。

1936年，耀翔应福建省教育厅办的中学教师暑期讲习会的邀请，我跟他回到久别的福建家乡，找到南营中军后的故居，新主人殷勤招待，领我凭吊儿时和双亲同住的小厢房。晚上，在陈仪省长召开的招待会里，遇郁达夫、常道直等。次日，同至西禅寺吃荔枝，并拍照留念。

1937年，抗日战争起，暨大由真如迁入市区，我们仍在该校任教。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发，暨大迁至福建建阳，我们因长子正奇患病，未能随往。耀翔到私立沪江大学任教，并在私立大夏和光华二校兼课。我则应老友曹未风（培城女校教务长，解放后，任上海高教局局长，已故）的邀请，在私立培成女校任课。因为私立学校设在租界内，与敌伪无关。是时，通货膨胀，物价一日数变，两人收入，不够买一担米，八口之家，无以糊口。挚友郑振铎、孙贵宣（复旦大学教授，已故）每日必来，彼此以“保持民族气节”六字互勉。郑这时独自迁居至徐汇区宛平路，或晚上住在我家亭子间里，躲避敌人的耳目，用心良苦。他苦中作乐，间或约我们到宛平路避难所，吃他自制的清蒸小鸡。

1943年，中华书局编辑来组稿，约我写《中国大教育家》一书，约耀翔写《儿童之语言与思想》一书，稿费各一万元，先付五千，我买了四担米，度过四个月。半年书成，又各付五千元，只能买大饼油条，全家分食。耀翔长叹说：“私立学校剥削教师，最后一月所发的薪水，也只能买大饼油条，想不到书局也效法剥削，真是杀人不见血！”以上两本书，都在1948年出版。

1944年，因通货膨胀，家庭入不敷出，生活水平不断下降，耀翔体重减轻了三十几斤。长子正奇病更深重。我患慢性肝炎，每星期除上培成女校三班课共十八小时外，又在大夏大

学、女子大学兼课，作为长子的医药费用。个别教授甚至靠摆地摊过活。我把望海居的藏书如《四部备要》、《图书集成》等卖掉。“清高”二字是“文革”中红卫兵批判我的口实，然而，这正是我洁身自好为教育事业献身的基础。当我在教书和家务操劳中耗去生命和精力的时候，我没有为高官厚禄所引动。国民党的要人来劝我入党，国社党的朋友来邀我做官，汉奸的熟人想拉我下水，统统被我拒之门外。李大钊老师的不屈不挠精神，是我终身虔奉的信条。

1945年抗战胜利，夜半消息传来，全弄喧哗。耀翔伤心地说：“八年苦难生活可能过去，但奇儿的病是否能转危为安！”是时，我担任大夏大学教授兼中文系主任。由吴文祺教授介绍，认识《前线日报》总编辑宦乡同志，委我担任该报的《妇女周刊》编辑。该刊仅出四期，因当局干涉我们的言论自由，和宦乡、吴文祺、周予同等集体退出《前线日报》。

1946年，长子正奇病重去世，年仅十八岁。1949年，我到新闻专科学校和南屏女中兼课，加上大夏大学三门课，每星期要上二十几小时课，以个人的全部薪水，还奇儿三年病中费用的欠债。中年丧子，深夜不眠，回想自从大学毕业后的二十多年中，我每一个白天都是在课堂上和抚养五个孩子的家事中度过，每一个夜晚都是在埋头批改学生的国文作业中溜走。我常说，我的时间是在讲台和学生作文簿里流逝的！

1948年，我参加大夏大学女同学召开的纪念三八节集会。1949年，我参加新闻专科学校女学生召开的三八节会。这两次会议的发言，如讨论妓女、花瓶以及教师、女工同工不同酬问题，既含蓄又深刻，大家觉悟都有所提高。足见当时女学生做地下工作很有成绩。1949年，上海解放，我听了这消息，好像得到新生，李大钊老师当年的仪容笑貌好像浮现于眼前，

马上参加市妇联的筹备工作，听了陈毅市长在天蟾舞台的报告，又参加了市人代会议，接触了工农商学兵等各界人士（我从解放后到1966年“文革”前，一直被选为上海市人民代表，现任市政协委员）。市妇联正式成立后，我担任常务委员兼文教委员会主任委员，经常同一些革命女同志接触交谈，她们爽朗豪迈的气概、大公无私的言行感染了我，她们是我学习的好榜样。这时，耀翔在复旦大学教育系任教。

1951年，上海各大学在党的领导下，进行院系调整，中山北路的旧大夏大学改为华东师范大学，指定曹未风、刘佛年、刘侠任、张祖培、黄健霭等和我为筹备委员，经常开会讨论建校事宜。在一次会上，决定复旦大学教育系调整到华东师大；这样，我和耀翔二人就都在华东师大任教。

1952年，上海各大学开展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我参加学习，批判自己享乐至上的资产阶级思想。其实，我和耀翔很少计较物质享受，只喜欢和志同道合的朋友品茗闲谈罢了。解放以后，由于工作忙，开会多，和朋友的交往逐渐减少了。有一天，中文系有一位同志对我说：“你确实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的，在思想改造中，批判自己也较深刻。民盟组织，旨在提高成员的思想水平，做好党的助手的，希望你能参加我们的组织。”我考虑再三，有些犹豫。后来想想，闻一多、李公朴不都是觉悟较高的盟员吗？他们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当了党的助手，流芳百世，民盟组织是有光荣传统的，于是毅然加入了民盟。1957年，被选为民盟上海市委委员。“文革”中停止活动。“四人帮”倒台后，恢复原职。

1953年，我担任“中国文学史”和“古典文学作品选”两门课。这些课程，虽教过多年，但我很谨慎，用较多时间备课，生怕立场、观点、方法有问题，贻害青年，不断学习毛主

席论文艺的文章以及外国关于文艺理论的译著，教学质量似有些提高。

1956年，英国罗素前夫人勃拉克作为英国妇女代表团团长又到中国，市妇联让我招待她。想不到，时隔三十多年，勃拉克还认得我。她在茶话会上感慨万千地说：“三十多年过去，见到你时我还未结婚，现在已成弃妇了。我到政府去告罗素，但没有一个人支持我。在我第一次到中国的时候，我是那样自傲，自以为比辛劳的中国妇女幸福多了。而今天，真正幸福的却是你们！你们有婚姻法的保障！”勃拉克的话确实反映了真实情况。

1958年，我校中文系师生到嘉定徐行公社劳动办学，我亦随往。白天劳动，年老教师摘棉花。晚上开会。虽然带一些书去，上课极少，我不禁有些茫然。有一天，阅报惊悉郑振铎先生出国访问，因飞机失事殉国，痛何可言！他临行时，还给我们写了信，这封信我们至今仍保存着。

1960年，五一劳动节第二天的晚上，耀翔中风，在华东医院住了一年多。我也住在医院里细心服侍，白天到学校上课，课毕马上回医院。这时，我担任中文系副主任，为五年级学生讲授“《诗经》研究”一课。

1963年4月的一天，耀翔满七十岁，也是我们结婚四十周年的纪念日，耀翔紧握我的手说：“我们二人共同生活在20世纪不平凡的岁月里，是幸福的。所恨者，我未能编出《中国心理学史》一书，不能整理旧作，不能陪你欢度晚年。但尚有四个子女，十个孙辈陪你，差可自慰。”次年7月，天气奇热，耀翔发高烧，患热病。9月进华东医院，不治，竟与世长辞，享年七十一岁。大殓的时候，我把一张二人合拍的照片，放在他的衣袋里，表示以过去之我，长伴他于地下；以今后之我，

为妇女已获解放的新中国服务。

耀翔去世后，我把全部精力都用于教学和科研方面。1965年底，华东师大中文系讨论《海瑞罢官》和清官问题。关于清官有两种不同意见：一为清官有进步意义，比贪官好；一为清官是软刀子，比贪官坏。接着，上海市开人代会，组织部分知识分子座谈上述问题，我仅将系里对清官问题的讨论情况汇报一番，躲了一次难关。1966年“文革”开始，打砸抢、逼供信横行天下，美好的社会主义神州，顿时变成鬼魅的魔窟。我校常溪萍校长和姚启钧教授、李平心教授等数十人，都死于非命。我赖中国传统的心理卫生方法，如孟子的不动心，庄子的善刀法，又度过了这次大难关。但我一颗火热的心，已化成了枯木死灰。1973年，系工宣队动员老教师退休，我也乐于退休，这样，我就过着与世隔绝的退隐生活五年。

“四人帮”倒台后，中国政权重新掌握在老一辈革命家的手里，又听了邓副主席在科学、教育两次会议上的讲话，我死灰的心复燃了。正好华东师大约我整理古籍和培养研究生，我和许杰、施蛰存等十余人都复职了。有一位同志问我说：“你腿不好，走路不方便，血压这样高，已经快八十岁了，为什么愿意复职？为什么要拼老命去教书、带研究生呢？”我只是笑而不答，因为回答他可能也不相信。我过去不是戴着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吗？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具体表现，就是名利思想，复职不是可以多得几十块钱吗？写东西不是可以名利双收吗？如果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我是多么难过啊！现在我不应该不说真话：我的复职，就是因为“四人帮”倒了，不专门搞阶级斗争了，摘掉我们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成了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全国上下，和衷共济，群策群力地大搞“四化”，扭转乾坤，把魔窟变成了天堂，逐渐恢复了社会主义的

优越性，妇女不再受二遍苦了。我愿意克服老病的困难，克服孤独的困难，以我的残年余力，为“四化”尽点滴力量。这样，才对得起旧社会受苦受难妇女的在天之灵，才对得起革命先烈李大钊老师。几年以来，我所完成的工作大致如下：为我校古籍研究室十一名研究生讲授“诗经研究”二十周，批改他们的论文十几篇。整理修改旧作《诗经译注》约六十余万言，编写《诗经漫话》约十万言。发表了有关《诗经》研究、赏析的文章约十篇，校点古籍约三十卷。1982年，我室改为古籍研究所，招了八名研究生，我和两位研究生一起学习《诗经》和《论语》，并准备明年为他们讲授关于训诂的课程。所谓为“四化”尽点滴力量者，如斯而已。

1980年劳动节，我校中文系和古籍整理研究室举行茶话联欢会，庆祝许杰、徐震堃和我执教六十周年，我们三人原来都在中文系工作，都是八十高龄。到会同志一致祝贺我们健康长寿，我们表示要在有生之年为实现“四化”多做贡献。有些同志即席吟诗写字，以志纪念。我也口占七律一首：

百花齐放艳阳天，圣代欣逢不羡仙。
八十校书期向朗，三年伏案效诗笺。
愿将嘉种校园播，岂计残躯老病添。
许徐二公吾法式，追随骥足志弥坚。

几句补充的话：

我幼小时，在先母严厉督促下，每日必读《诗经》。《诗经》四言，句短有韵，容易背诵，所以特别欢喜它。进北京女高师肄业后，由于黄侃老师的循循诱导，尤好诗歌及习作。他在中国文学史课上说：“《诗经》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

它给后代的文学影响极大，学习文学史不可数典忘祖。”毕业以后，我也担任“中国文学史”这门课程，在探索诗歌的源流演变中，更觉得《诗经》的创作方法与艺术特点给后人的影响确实深远，更引起了我对它的重视和兴趣。1960年，华东师大中文系五年级开了几门选修课，让我担任“诗经研究”。在此期间，我搜集了一些资料并作几个专题研究。例如关于“兴”的问题，苏辙说：“夫兴之为体……故其类可以意推而不可以言解也。”陈启源说：“比、兴皆托喻，但兴隐而比显，兴婉而比直，兴广而比狭。”可见古人多认为“兴”的艺术手法是不够明显，不容易搞清楚的。近代学者，也有这样的言论。刘大白《白屋说诗》说：“赋是敷陈，比是譬喻，这是不很发生问题的。至于兴，似乎比较费解了。其实简单地讲，兴就是起一个头。”何定生《关于诗的起兴》说：“兴是什么，我们不免要茫然的。最少，何以别于比，我们不知道。”顾颉刚《写歌杂记》说：“赋和比都容易明白，惟独兴，却不懂得是怎么一回事。”解放以后，对赋、比、兴问题，也有人写论文讨论过。举例来说，如《文学遗产》增刊第一辑中《〈诗经〉中的赋、比、兴》一文，却否定了兴的艺术手法的存在。认为“兴是他们（儒家的诗经学者）脑子里想出来的，如果我们要说《诗经》里面真是有一种什么所谓兴，那么这种兴究竟是什么性质，是无法弄清的。”我心里想，这种对兴的艺术手法持否定态度，恐怕是很有问题的。于是将三百篇逐篇加以细查、分析，总结出“兴和比、赋的差别”、“诗经中兴的几种形式”、“兴在诗中所起的六种作用”。再从诗歌史去观察，比兴手法自《诗经》后就一直有所发展，屈原的美人香草，也不是单纯的比喻，后来的诗人和词曲家，也一直在运用着、发展着的。否定《诗经》中的兴，也就是否定这种比兴手法的历史联系。我

的最后结论是：首先，兴是《诗经》艺术特色之一，它是诗词曲比兴手法的开头。其次，解放以后，一般学者对《风》诗做了许多研究、分析、译注等工作，贡献很大。但对《雅》诗不够重视，注释、翻译的也较少。《雅》诗虽有一些糟粕，应该批判，但作者多为统治阶级中受压抑的人物，他们受过文化教养，对统治者内部情况较劳动人民了解得更深入、广泛。如《十月之交》指名道姓地斥责统治者的罪恶，表现手法多样化。不能因为他们的出身或语言古奥而受歧视，应该实事求是地评价古人。就恋爱婚姻诗而言，如《谷风》、《白华》、《车辚》等，都是极动人的好诗。第三，有的作品对《诗经》的思想意义分析较详，对它的艺术性分析较略。我们今天要批判地继承古典文学的优良传统，目的在于古为今用。了解《诗经》的思想性固然重要，了解它的艺术性更重要，不可偏废。所以我在讲授“诗经研究”的时候，侧重于艺术特色的介绍。第四，古代经师对诗篇的主题，有所歪曲。我持就诗论诗的态度，恢复它的本来面目。对《毛序》、《毛传》以及三家诗说等，则采取一分为二的方法，既肯定优点，也指出其缺点。有人把它一棍子打死，或者把它捧上天，都是不妥当的。

课余之暇，多征求同学和助手的意见，纠正我在教学中不足之处。总之，多年来，我在党的教育下，掌握了一些工作方法，如调查研究、总结、实事求是的精神，古为今用的原则，一分为二的方法及群众路线等，运用于科研、教学，也是无往而不利。

主要著述目录

中国大教育家 1948年 中华书局

- 诗经译注 1982年付印 上海古籍出版社
- 诗经漫话 1982年付印 上海文艺出版社
- 论周秦学派的渊源 1920年 女高师《文艺会刊》
- 论妇女解放 1921年《女高师校刊》
- 中国古代学者论人性的善恶 1922年《心理》
- 诗之修辞 1922年《学衡》
- 汉魏时代之心理测验 1923年《心理》
- 诗人之注意及兴趣 1923年《心理》
- 忆庐隐 1946年《前线日报·妇女周刊》
- 忆雪林 1946年《前线日报·妇女周刊》
- 略谈诗经 1957年《语文教学》
- 略谈诗经的表现手法 1957年《语文教学》
- 略谈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的规律（合写） 1959年《文汇报》
- 从民间文学有没有局限性想起的（合写） 1959年《文汇报》
- 应该把作家文学视为“庶出”吗？（合写） 1959年《解放日报》
- 从曹操说起（合写） 1959年《解放日报》
- 五四运动回忆点滴（合写） 1959年《文汇报》
- 中国古典诗歌规律性问题（合写） 1962年《华东师范大学学报》
- 诗经的比兴 1978年《文学评论丛刊》第1辑
- 诗经的语言艺术——兼论诗、词、曲的修辞（合写） 1980年《文学遗产》
- 略谈诗经比兴的发展 1981年《华东师范大学学报》
- 诗经的复迭 1981年《语文函授通讯》
- 略谈诗经 1981年《语文学习》
- 历代诗经研究述评 1982年《华东师范大学学报》
- 漫谈孟子《齐桓晋文之事章》 1959年《语文教学》
- 诗经·采薇 1982年 华东师范大学《大学语文选讲》第1辑
- 诗经·氓 1982年 华东师范大学《大学语文选讲》第2辑
- 一九八〇年三八节有感 华东师范大学校刊
- 校点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约二十卷） 中华书局

校点《历代书法论文选》(约一百页) 1979年上海书画出版社

校点刘宝楠《论语正义》 1982年 古籍出版社

校点程树德《论语集释》 1983年 中华书局

校点陈奂《诗毛氏传疏》 1983年 中华书局

(程俊英先生于1993年2月20日逝世)